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开发开放浦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重大决策，推进上海浦东跃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30年沧桑巨变，而立之年的浦东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拓展了新路。

1978年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取得了重要成果，广东迅速崛起。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由此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提上中国发展的议程。那么接下来是哪里呢？既要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又要能托起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党中央把目光锁定在浦东。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浦东的开发开放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全局的必然抉择。“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16字方针深刻揭示了浦东开发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

开发浦东，带动浦西，从根本上解决上海长期存在的东西失衡的历史问题。多少年来上海流传一句顺口溜，“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地日益成为制约城市发展最紧缺的资源。当时以浦西为主体的上海再想发展，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土地这道坎。可是，就在一江之隔的黄浦江之东，有几百公里未开垦的土地、滩涂，茅草丛生，如果把这片土地唤醒，那将会创造多么大的财富。开发浦东带动浦西，将赋予上海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发开放浦东，将牵引上海奋起直追实现历史性跨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上海将诞生。

抓住“最后的机遇”，振兴上海。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



□ 徐伟新

开发开放浦东——“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一，还曾是共和国的长子。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为国家完成财政收入4725亿元，提供全国使用的国民收入达2963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即1979年至1988年，上海提供给全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可以再建两个上海这样规模的工业基地。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自身的地位明显下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严重，有几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经济增长连续7年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我的父母都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他们结婚。为了解放台湾，我的父亲和战友们在苏州河里练习游泳，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改写了历史。到上世纪80年代，苏州河散发着刺鼻的恶臭，水质下降到5级，大肠杆菌超正常量10倍，哪里还能游泳？邓小平说，“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了”。“最后一次机遇”，振聋发聩。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全球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历史潮流中，上海唯有奋发前进，没有退路，于是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势在必行，一触即发。

打出王牌，服务全国。在一个棋局中，王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棋子。中国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建4个经济特区，主要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下考虑，经过12年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对企业制度、对经济体制创新、对政府管理模式、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等等，都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时代正呼唤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到来。上海是中国传统体制的一个缩影，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已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典型。因此上海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全国改革的成败，上海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打好这张王牌，就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道路；打好这张王牌，中国发展就满盘皆活。开发浦东，振兴上海，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中国体制改革创新向啃硬骨头发起了总攻。一场战略决战的风暴由此从中华腹地掀起。

面向世界，把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邓小平曾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

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发端于大西洋两岸，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拓展到太平洋两岸。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是世界上古老文明唯一不曾间断且生生不息的国家，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上，都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不期而遇。开发开放浦东，振兴上海，推动中国汇入太平洋，融入全世界，从而推动中国走上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其改革开放的地位和意义不言而喻。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对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前途表示怀疑。基于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清醒判断，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要体现出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在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上，他亲自将“开发浦东”改为“开发开放浦东”。

浦东带着上海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希冀，带着中国进一步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坚定信心，带着社会主义的使命与未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隆重登场。

光阴荏苒，而立之年的浦东已成为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创造了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等一系列“第一”，为世界惊叹。浦东的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8年的1万亿元，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习近平同志2010年考察浦东时强调，“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在于发挥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发扬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精神，在于发挥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这“三个在于”是对浦东工作的总要求。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要求，“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这“四个放在”是上海一切工作的基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在一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发展进入新时代。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进入新时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全球化遭遇重大波折，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新形势赋予上海一系列新的重大使命和任务：“做国家的试验田，而不是地方的自留地；做制度创新的高地，而不是优惠政策洼地；种苗圃，而不是栽盆景。”2019年6月，在浦东开发开放即将进入3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着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开拓性创新，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着力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增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制度供给能力。通过7年左右努力，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在高水平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30年前，在“进一步开放的旗帜”引领下，浦东从贫瘠之地踏上跨越式发展的征程，掀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篇章。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下，浦东以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牵引，在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风云中坚定前行，我们期待着浦东再出发之后的再发展，期待再发展之后的新浦东。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机关节省公物的“边区经验”

□ 林 宁

抗日战争中后期，党中央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积蓄物资备战备荒，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学校三大系统深入开展生产运动，同时组织开展节约运动。在机关节约运动中，节省公物成为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试验区和示范区，在抓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方面积极探索，创造了“边区经验”。

制定供给标准，把好节省第一关

缩减公物供给是节省公物的第一关。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年初根据节省原则制定下发年度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

机关日常公物主要包括办公公物和伙食公物，办公公物细分为灯油、纸张、笔、墨等，伙食公物细分为粮食、肉、菜、食盐、石炭、青油等，同时明确各物供给量标准和价格标准，用“双标准”扎紧节省公物的篱笆，防止巧立名目无端浪费。比如1943年度机关办公公物供给量标准为：灯油，干部二人一灯，杂务人员四人一灯，春夏两季每日每灯六钱，夏秋两季每日每灯三钱；纸张，每人每月九张；笔，干部每人每月一支，杂务人员每人每月两支；墨，干部每人每月二钱，杂务人员每人每月一钱。伙食公物供给量标准为：机关大灶每人每日小米一斤三两（一斤等于十六两），每月肉三斤，每日菜一斤、食盐五钱、石炭一斤四两、青油五钱。各物价格标准明确以当地之平均价格为准。

随着节约运动的推进，边区政府加大机关节省公物的力度，视情降低部分日常公物的供给标准，力促机关工作人员养成节省公物的习惯。1944年度边区政府大幅降低了机关办公公物供给标准，对机关干部的纸张、笔、墨三项公物每人每月的供给量就分别比1943年度减少了一半。

制定标准关键在于严格执行。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执行的第一年，边区政府对边区一级机关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年度检查，发现了一些超标浪费问题，也找到症结所在。《边府系统各单位1943年机关生产总结》写道：今年我们“只注意了煤炭、粮食节约，而对文具、纸张、灯油等办公用品都忽视了。七、八、九三个月，如办公用品超

支纸张1914张……这主要的由于领导方面的忽视，做供给工作的同志粗枝大叶”。

要解决领导把关不严问题，仅通过平常检查纠正是不够的。1945年1月，边区政府完善供给预算审核制度，一是要求各单位首长对该单位提出之预算，应负责慎重审核，提出该预算是否必需，及所需物品确实数量之意见；二是要求各单位之主管供给机关负责该预算之第二次审核，审查该预算有无虚报多报或浪费情形。此举为机关各单位落实领导责任，把好公物开支预算关，严格执行公物供给标准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开展重点研究，推广节省经验

节省粮食既是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的紧迫任务，也是财经工作机关需要极力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1943年底至1944年初，负责边区财经工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通过广泛搜集节省粮食的个体经验加以研究，总结提炼出适合推广的高效做法。他们选定在边区的中直机关为调研样本，1943年全年该系统节省粮食就达1100石。

西北财经办事处主要针对“能不能节省”“最多能节省多少”和“怎样节省”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找寻答案。1944年2月，他们将研究成果写入《财政工作总结》，并向全边区机关推广节省粮食经验。

“能不能节省”的答案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研究指出：“实际上政府所规定的吃粮标准是有富裕的，机关人员每人每日一斤三两，而中央系统每人每日吃粮数，生产突击等特殊情况不论，一般仅十一两四至十六两二”，“根据政府规定吃粮标准，节约粮食是完全可能的”。

“最多能节省多少”的答案是“每人每日节约三两小米”。这一节省目标，他们是通过召集中直机关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充分讨论得出的。这个经验后来被全面推行，在全边区备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5月为应对春季无雨导致粮食作物严重复发的突发危机，边区政府果断决定自6月1日起对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系统各单位粮食供给标准普遍减少每人每日三两小米。

“怎样节省”的答案是“关键是改善炊事工作”。他们总结提炼出六个管

用经验。比如“煮饭下来，应详细统计吃饭人数，按人数下来，吃馍后，少下米”“剩余米饭，下顿煮食或拌油炒食，剩余面食留下顿煮稀饭食用，锅巴黄者煮稀饭，焦者喂猪”，这两个方法能有效解决全边区机关炊事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饭前下来不计算、饭后剩饭整桶喂猪养鸡这一浪费粮食问题。

树立榜样人物，弘扬节省作风

1943年，边区政府组织在全边区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运动，并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五大系统中择优选出185位“劳动英雄代表”参加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所致的大会闭幕词中对数十位劳动英雄代表进行了点名赞扬，其中有一位是机关的代表——“节省公物的佟玉新”。

佟玉新是中央出版发行部下设中央印刷厂的总务处管理员。为改进烧水工作，他被总务处派去水房烧水，“到水房工作十七个月和以前比较，共节省石炭十二万五千斤，以当时市场炭价合算得一百一十二石五斗细粮，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节约成绩。”佟玉新被选树为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的榜样人物，而且得到林伯渠主席的高度赞赏，不仅仅因为他是节省公物成绩突出，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巾展现出了苏区时期形成的刻苦节省作风，这种优良作风是需要机关在节省公物中大力弘扬的。

“斗争、钻研、增效”是佟玉新节省公物的鲜明特点，它集中体现了节省的优良作风。“斗争”是坚决地与浪费现象作斗争。他看到烧水工人“对公家东西毫不爱惜，老是大块大块的烧炭，炭渣到处都是”，就果断地将他撤掉了。“钻研”是仔细研究存在的浪费问题，找到节省的办法。他改造灶门尺寸，调整炉条高度和间隔距离，这样炭不会漏下去，且可以烧透。改进烧法，利用炭皮、烂炭渣、碎石炭、木炭渣、刨花等为燃料。“增效”是在节省的前提下，增大工作的效能。过去水房每天烧炭320多斤，却只能烧水10锅，每锅水要1小时15分钟以上才能烧开，因为水不够，工人常到水房吵闹。而他每天烧炭70斤左右，却能烧水26锅，每锅平均半小时就开了，开水热水喝用不完，随时都有。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党的历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党的第一支纪检监察铁军就是在武汉诞生的。

党的五大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5月9日，在汉口黄陂会馆（现汉口自治街31号）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7名正式委员为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名候补委员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首次对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设置의探索和尝试。

1927年6月1日，根据党的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称为五大党章）。由于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虽然那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但也正是这一次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即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党章还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の层面。后来的实践证明，党的纪律建设需要专门的纪律检查机关来维护，没有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党的纪律建设就很难有效保障。

纪律严明、忠贞不屈是纪检监察人的本色

执纪者必先守纪。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纪律检查的最高机构，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没有一个叛变投降；在严峻的历史时刻保密纪律是最重要的纪律，10人中也没有1人出卖党的秘密。这10人中有6人牺牲在1927年、1928年间，总计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只有1人看

到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早期的纪检监察人的精神风范，也体现了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有着光荣的传统。由于委员们大多过早地在革命中英勇牺牲，他们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未来得及投身于党的纪律建设事业，导致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后来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这支纪检监察铁军何其悲壮。

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参加完党的五大后，和副主席杨匏安一同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面对屠刀，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于11月11日夜英勇就义。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的烈士还有：1927年5月，萧石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牺牲时距离当选候补委员仅19天。1927年7月，张佐臣、杨培森在上海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牺牲时张佐臣年仅21岁。1928年6月，许白昊在上海壮烈牺牲。1928年10月，蔡以忱因叛徒出卖被捕，就义前赋绝笔诗一首：“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蔡以忱出生于武汉，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武汉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人们对蔡以忱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过的一句话，“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1931年8月，杨匏安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时年35岁。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他不为所动，甚至摔掉蒋介石的劝降电话。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的名句。1935年3月，阮啸仙牺牲，他曾是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

良好的家风家教是纪检监察人的优良传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首届监察委员会委员们恪守了纪检监察人纪律严明、忠贞不屈的本色，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赞歌。

王荷波1927年牺牲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王荷波的长子王复荣生于1919年，长大后承继父志，于1937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南京



□ 吴瑛琪

沦陷时，被日寇逮捕，捆绑在灯柱上烧死，殉难时年仅19岁。大女儿王晓珍，新中国成立后与王荷波夫人住在南京，是南京中国银行的一名普通干部。二女儿王修竹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于北京邮票厂，至离休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王荷波的后代都始终牢记他的嘱托，低调做人、勤勉工作、清廉自持，不给党添麻烦、不搞特殊化，不打革命烈士的旗号。

其他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的后代也都恪守先辈们的嘱托，传承了优良的家风家教。杨匏安牺牲后4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许白昊的后人每年清明时诵读家训“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蔡以忱后代生活困难仍不愿给政府添麻烦，这样的事迹太多太多。首届纪检监察铁军坚定的信仰，不屈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家风家教，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并激励着我们在纪律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